

散 文 海 外 版 精 品 集



百期精华

人物绘像



《散文海外版》自1993年元旦创刊，至2009年7月，出版已经整整100期了。为了铭记我们这一本纯文学杂志的历史印迹，我们精心选编了这套《百期精华》。所谓“100期·100家·100篇”，即是100期中100位名家的100篇散文力作。

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\选编

100期·100家·100篇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百期精华

100期 · 100家 · 100篇

· 画像

—— 取义海外版编辑部 \ 选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期精华. 人物绘像/散文海外版编辑部编. - 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5306-5226-8

I. 百… II. 散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世界 IV.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381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42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3000 册 定价: 32.00 元

目 录

-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季羨林(001)
- 我吻女儿的前额 阎 纲(011)
- 梦之魂 竹 林(017)
- 巴金与萧乾
- 怀念曹禺 巴 金(026)
- 树犹如此 (美国)白先勇(030)
- 纪念亡友王国祥君
- 写给母亲的祭文 陶斯亮(043)
- 小别赠言 唐 敏(047)
-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高洪波(050)
- 怀念汪曾祺先生
- 跨过那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(056)
- 平常的沈从文 黄永玉(067)
- 怀念钱钟书先生 张隆溪(073)
- 寻访张园 朱增泉(088)
- 爷爷和真君 (美国)聂华苓(099)
- 荷香深处祭文魂 从维熙(110)
- 爱情是不能解释的 (法国)卢 岚(118)

追寻那遥远的美丽	梁 衡(122)
惜别老罗	刘心武(130)
何期执手成长别	范 曾(134)
奶奶在花园	小 红(148)
摇曳秋风遗念长	孙晓玲(156)
娘,我的疯子娘	王恒绩(166)
荞花盛开	郭文斌(172)
怀念母亲	迟浩田(184)
人生几度秋凉	王充间(191)
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	耿 立(205)
扇嘴巴子的故事	李钢林(217)
大儒无声亦有声	韩小蕙(230)
今夜星光灿烂	王安忆(235)
芳草王孙天涯	(美国)朱琦(242)
大美者无言	舒 婷(258)
大爱无边	王兆胜(270)
村子	孟宪杰(275)

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

□ 季美林

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。他虽已长眠地下,但是他那典型的“我的朋友”式的笑容,仍宛然在目。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,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。

1948年12月中旬,是北京大学建校50周年的纪念日。此时,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,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。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,不但不惶惶,而且在人们的内心中,有的非常殷切,有的还有点狐疑,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。适逢北大建校大喜的日子,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,聚集在沙滩子民堂中,举行庆典。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,满面含笑,做了简短的讲话,只有喜庆的内容,没有愁苦的调子。正在这个时候,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。大家相互开玩笑说:“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!”简短的仪式完毕后,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,登上飞机,飞赴南京去了。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:“最是仓皇辞庙日,教坊犹唱别离歌,挥泪对宫娥。”我想改写一下,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:“最是仓皇辞校日,城外礼炮声隆隆,含笑辞友朋。”我哪里知道,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。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,这是含笑不起来的。

从此以后,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,分道扬镳,“世事两茫茫”了。听说,他离开北平后,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,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。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。飞机返回以后,机舱门开,他满怀希望要同老

友会面,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,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。据说——只是据说,他当时大哭一场,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待多久,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以后,他也逃往台湾。后来又回到美国去住了几年,并不得志,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,已不复存在。后来又回到台湾。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。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,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,日子过得并不顺心。后来,不知怎样一来,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,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,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。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,一直迷恋于《水经注》的研究,如醉如痴,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。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。可惜仁者不寿,猝死于宴席之间。死后哀荣备至。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,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,并建立了胡适陵园,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中。今天我们参拜的,就是这个规模宏伟、极为壮观的陵园。

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,鞠躬之后,悲从中来,心内思潮汹涌,如惊涛骇浪,眼泪自然流出。杜甫诗:“焉知二十载,重上君子堂。”我现在是“焉知五十载,躬亲扫陵墓”。此时,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,距适之先生所待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,只差几步之遥了。回忆自己八十多年坎坷又顺利的一生,真如一部二十四史,不知从何处说起了。

我一生遇到的六位恩师

积八十年之经验,我认为,一个人生在世间,如果想有所成就,必须具备三个条件:才能、勤奋、机遇。行行皆然,人人皆然,概莫能外。别的人先不说了,只谈我自己。关于才能一项,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。但是,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,这一点自知之明,我还是有的。谈到勤奋,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,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。但是,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:机遇。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,主要是靠机遇。

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,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。韩愈说: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”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,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。然而,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,只有汉文把“恩”与“师”紧密地嵌在一起,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。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,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。

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,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。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,但是,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。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,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已经发表的著作,旁听过他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,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。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,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,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。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,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。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课的通告时,我喜极欲狂。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?最初两个学期,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。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,而且备课充分,讲解细致。威仪俨然,一丝不苟。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,受益之大,自可想见。二战爆发,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。已经退休的原印度学讲座教授西克,虽已年逾八旬,毅然又走上讲台。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。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,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,包括《梨俱吠陀》、《大疏》、《十王子传》,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。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,他是世界最高权威。我并非天才,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,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。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,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,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。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:敬谨遵命。现在回忆起来,冬天大雪之后,在研究所上过课,天已近黄昏。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。雪厚路滑,天空阴暗,地闪雪光,路上阒静无人,我搀扶着老爷子,一步高,一步低,送他到家。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,当时我真觉得,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。他为了学术,不惜衰朽残年,不顾自己的健康,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。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,感激与

温暖并在,担心与爱怜齐涌。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。

二战期间,我被困德国,一待就是十年。二战结束后,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。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,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,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。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,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。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,名扬全球;但是,门槛一向极高,等闲难得进入。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,我焉有不愿意之理!我立即回信同意。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,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,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。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,一言九鼎。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。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,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籍名,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。唐代中了进士,就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遍长安花”。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;但是,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,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,不也是人之常情吗?

典型的“我的朋友”式的笑容

在此后的三年内,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(汤用彤)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,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。我同适之先生,虽然学术辈分不同,社会地位悬殊,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。但是,实际上却不然。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,他那一间在子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,我几乎是常客。作为系主任,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。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,我又是撰稿者,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。最难能可贵的是,他待人亲切和蔼,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,对教授是这样,对职员是这样,对学生是这样,对工友也是这样,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,教授架子。此外,在教授会上,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,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,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。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,在他面前,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,经常如坐春风中。

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,他绝不老气横秋,而是活泼有趣。有一件小事,我至今难忘。有一次召开教授会,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,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,他把画带到了会上,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,大家都啧啧称赞。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,走到桌前,把画卷了起来,做纳入袖中状,引得满堂大笑,喜气洋洋。

这时候,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,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,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。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。他多次会见他们,并设宴为他们接风。师觉月做第一次演讲时,适之先生亲自出席,并用英文致欢迎词,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,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,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。

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,忙于对西方,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,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,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。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《中国哲学史》,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,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。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,忙于同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,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。回国以后,迫于没有书籍资料,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。在解放前的三年中,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:一篇是《浮屠与佛》,一篇是《列子与佛典》。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。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两老我都不敢得罪,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。我想,适之先生不会没读到这一篇论文的。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。蒙他首肯,介绍给地位极高的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》发表。第二篇文章,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,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,信中说:“《生经》一证,确凿之至!”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。他承认了我的结论,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。这一次,我来到台湾,前几天,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,中间他讲到,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,在下午饮茶的时候,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。有一次,他说:做学问应该像北京

大学的季羨林那样。我乍听之下,百感交集。适之先生这样说,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,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。这说明,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。知己之感,油然而生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?

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

在政治方面,众所周知,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。但是,我们不应忘记,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。我认为,在他的心目中,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,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。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。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设什么“终极真理”。而世界上所有的“主义”都与“终极真理”相似,因此他反对。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。他自己说,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,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。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。解放前夕,北平学生经常举行示威游行,比如“沈崇事件”、“反饥饿反迫害”等等,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,这一点是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”的,适之先生焉能不知!但是,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,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,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,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。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,为了同样的目的。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。我个人觉得,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。另外一件事是,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,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: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,希望他不要走,北平解放后,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。他听了以后,含笑对那个学生说:“人家信任我吗?”谈话到此为止。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会不明白,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,怒发冲冠,态度依然亲切和蔼。小中见大,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。

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,誉满士林。我觉得,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,一个怪圈中:一方面是学术研究,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。

他一生忙忙碌碌，恹恹奔波，作为一个“过河卒子”，勇往直前。我不知道，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我认为，这个怪圈确实存在，而且十分严重。那么，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？我觉得，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，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，说不好听一点，就是一个书呆子。我也举一件小事。有一次，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。会议开始时，适之先生匆匆赶到，首先声明，还有一个重要会议，他要早退席。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，有人忽然谈到《水经注》。一听到《水经注》，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，眉飞色舞，口若悬河。一直到散会，他也没有退席，而且兴致极高，大有挑灯夜战之势。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？

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，现在笼统称之为“优点”。我认为，其中最令我钦佩，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。“平生不解掩人善，到处逢人说项斯。”他正是这样一个人。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。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，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“恩师”；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，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，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。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。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携。四十年代，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，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。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，倾向进步，参加革命，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。杨联升留在美国，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，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，互相唱和。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，名扬海外。周的天才与功力，只能说是高于杨，虽然在学术上也有表现；但是，格于形势，颇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。看了二人的遭遇，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？

与适之先生分别之后

我同适之先生在子民堂庆祝会上分别，从此云天渺茫，天各一方，再没有能见面，也没有能通音讯。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内地方面的情况。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，怀着绝对虔诚

的心情,向往光明,向往进步。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,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,有点忘乎所以了。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,一踏上“革命”之路,便步步登高,飞驰前进;再加上天纵睿智,虔诚无垠,全心全意,投入造神运动中。常言道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,大家群策群力,造出了神,又自己膜拜,完全自觉自愿,决无半点勉强。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。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,虽有缺点,并无罪恶;但是,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的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:“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,思想臭!”西方人说:“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。”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,积久而成为一种“原罪”感,怎样改造也没有用,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“老九”的地位,改造,改造,再改造,直改造得懵懵懂懂,“两涘渚涯之间,不辨牛马”。然而涅槃难望,苦海无边,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。通过无数次的运动,一直到十年浩劫,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,皮开肉绽,仍然不停地膜拜,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。改革开放以后,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,“觉今是而昨非”,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,垂垂老矣,离着鲁迅在《过客》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。

至于适之先生,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,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;总起来说,我是不十分清楚的,也是无法清楚的。到了1954年,从批判俞平伯先生《红楼梦》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,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。这是一场缺席批判。适之先生远在重洋之外,坐山观虎斗。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,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,他乐得怡然观战。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,浑身是箭,一个不折不扣的“箭垛”。内地众家豪杰,个个义形于色,争先恐后,万箭齐发,适之先生兀自岿然不动。我幻想,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。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、时间和精力之余,终成为“竹篮子打水——一场空”,乱哄哄一场闹剧。

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,享年已经过了古稀,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,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;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,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。中国古称“仁者寿”,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“仁者不寿”。当时

在内地“左”风犹狂，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，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，永世不得翻身了。这样一个人的死去，有何值得大惊小怪！所以报纸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。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，毫无所知。十几二十年以后，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亮的时候，我越想越不是滋味，曾写了一篇短文：《为胡适说几句话》，我连“先生”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，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。文章终于发表了，反应还差强人意，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。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最近几年，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。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，身上的枷锁除掉了，原罪之感也消逝了，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，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。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，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，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出版界也奋起直追，出版了几部《胡适文集》。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，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《胡适全集》。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，出版社竟垂青于我。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，我诚惶诚恐，力辞不敢应允。但是出版社却说，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铁证如山，我只能“仰”（不是“俯”）允了。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。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，副标题是：还胡适以本来面目。意思也不是想拨乱反正，以正视听而已。前不久，又有人邀我在《学林往事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，理由同前，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。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：毕竟一书生。原因是，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，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？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象适之先生的看法，是比较实事求是的。

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，俱往矣，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。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到了望九之年，居然还能来到宝岛。到了台北以后，才发现，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，比如梁实秋、袁同礼、傅斯年、毛子水、姚从吾等等，全已作古。我真是“访旧全为鬼，惊呼热中肠”了。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，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。

我站在适之先生墓前，心中浮想联翩，上下五十年，纵横数千里，往

事如云如烟,又历历如在目前。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,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。按照这个旧理,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,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。但是,我此时虽思绪混乱,神智还是清楚的,我没有这样做。我环顾陵园,只见石阶整洁,盘旋而上。陵墓极雄伟,上覆巨石,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。墓后石墙上嵌有“德艺双隆”四个大字,连同墓志铭,都金光闪闪,炫人双目。我站在那里,蓦抬头,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“我的朋友”式的笑容,突然显现在眼前,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,历史仿佛没有移动。但是,一定神儿,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,历史毕竟是动了。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,我现在大有“老骥伏枥,志在万里”之感。我相信,有朝一日,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,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墓前。

后 记

文章写完了。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北大建校50周年一事,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。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;但是说它是“铁证如山”,我还没有这个胆量。怎么办呢?查书。我的日记在“文革”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,无巧不成书,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。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,没能查到。但是,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,到了南京,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50周年庆祝典礼,发言时“泣不成声”云云。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。又一个怎么办呢?一是改写,二是保留不变。经过考虑,我采用了后者。原因何在呢?我认为,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,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,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。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,必然是因为我认为,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,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,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,不加更动。但那毕竟不是事实,所以写了这一段“后记”,以正视听。

我吻女儿的前额

□ 阎 纲

女儿阎荷，取“延河”的谐音，爸妈都是陕西人。菡萏初成，韵致淡雅，越长越像一枝月下的清荷。大家和她告别时，她的胸前置放着一枝枝荷花，总共三十八朵。

女儿1998年查出肿瘤，从此一病不起。两次大手术，接二连三地检查、化疗、输血、打吊针，祸从天降，急切的宽慰显得苍白无力，气氛悲凉。可是，枕边一簇簇鲜花不时地对她绽出笑容，她睁开双眼，反而用沉静的神态和温煦的目光宽慰我们。我不忍心看着女儿被痛苦百般折磨的样子，便俯下身去，梳理她的头发，轻吻她的前额。

神使鬼差般的，我穿过甬道，来到协和医院的老楼。二十一年前，也是协和医院，我在西门口等候女儿做扁桃腺手术出来。女儿说：“疼极了！医生问我幼儿时为什么不做，现在当然很痛。”其状甚惨，但硬是忍着不哭，怕我难过。羊角小辫，黑带儿布鞋。十九年前，同是现在的六七月间，我住协和医院手术。

穿过甬道拐进地下室，再往右，是我当年的病房，死呀活呀的，一分一秒的，就是在这里度过的，这里还留着女儿的身影。此前，我在隆福医院手术输血抢救，女儿十三岁，小小的年纪，向我神秘地传递妈妈在天安门广场的见闻，带来天安门诗抄偷偷念给我听。她用两张硬板椅子对起来睡在上面陪住，夜里只要我稍重的一声呼吸或者轻微的一个翻动，她立刻机警地、几乎同步地坐起俯在我的身边，那眼神与我方才

在楼上病房面对的眼神酷似无异。替班的那些天,她不敢熟睡。她监视我不准吸烟。有时,女儿的劝慰比止痛针还要灵验。

回到病房,我又劝慰女儿说:“现在我们看的是最好的西医郎景和,最好的中医黄传贵,当年我住院手术不也挺过来了?那时好吓人的!”女儿嘴角一笑,说:“你那算什么?‘轻松过关’而已。”她千叮咛、万嘱咐,一定提醒那些对妇科检查疏忽大意的亲友们,务必警惕卵巢肿瘤不知不觉癌变的危险,卵巢是个是非之地,特别隐蔽,若不及时诊治,就跟她一样受大罪了。

最后的日子,五大痛苦日夜折磨着我的女儿:肿瘤吞噬器官造成的剧痛;无药可止的奇痒;水米不进的肠梗阻;腿、脚高度浮肿;上气不接下气的哮喘。谁受得了啊?而且,不间断地用药、做检查,每天照例的验血、挂吊针,不能将痛苦减轻到常人能够忍受的程度。身上插着管子,都是捆绑女儿的锁链,叫她无时无刻不在炼狱里经受煎熬。“舅妈……舅妈!”当小外甥跑着跳着到病房看望她时,她问了孩子这样一句话:“小璞,你看舅妈惨不惨呀?”孩子大声应道:“惨——”声音拉得很长,病房的气氛顿觉凄凉。同病房有个六岁的病友叫明月,一天,阎荷坐起梳头,神情坦然,只听到一声高叫:“阎荷阿姨,你真好看,你用的什么化妆品呀?”她无力地笑着:“阿姨抹的是酱豆腐!”惹出病房一阵笑声。张镗和周明几位作家看望,称赞“咪咪,真坚强!”女儿报以浅笑,说:“病也坚强!”又让人一阵心酸。

胃管里流出黑色的血,医生急忙注射保护胃黏膜和止血的针,接着输血。女儿说:“现在最讨厌的是肠梗阻。爸,为什么不上网求助国际医学界?”我无言以对。女儿相信我,我会举出种种有名有姓的克癌成果和故事安抚她,让她以过人的毅力,一拼羸弱不堪的肢体,等待奇迹的出现。我的心情十分矛盾:一个比女儿还要清醒、还要绝望的父亲,是不是太残忍?可是,我又能怎么做呢?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,只能以最大的耐心和超负荷的劳碌让她感受亲情的强大支持。夜深了,女儿周身疼痛,但执意叫我停止按摩,回家休息。我离开时,吻了吻她的手,她又拉回我的手不舍地吻着。我一步三回头地出了病房,下楼复上楼,见